

许鹿希 著

邓稼先

图片传略



是的，邓稼先
再次遵循他的征程
因为他的灵魂还在
前进的路上。

这是他的精神品质

前进的脚步

一生的人

我们怀念邓稼先

是有真正永恒的

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
是有方向的，有
意识地前进的。
没有空想，没有矛盾。



许鹿希 著

邓稼先

图片传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稼先图片传略/许鹿希编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2

ISBN 7 - 5336 - 3570 - 1

I. 邓... II. 许... III. 邓稼先—生平事迹—图集
IV. K826.1 -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854 号

责任编辑:王宏金 张丹飞 整体设计:黄 彦
技术编辑:吴丽君 李 松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16
印 张:5
字 数:60 000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2 001—3 000
定 价:23.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1924 到 1986，一个短短的生命历程，在历史的长河中，似乎算不上什么，但这个对人类、对历史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的一生，却是值得我们追忆和展示的。

零散的图片，串起来就是完整的一生。在这里，邓稼先的事业、爱情、友谊都得以全方位的再现。这些图片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弥足珍贵，其中许多尚属首次公开。

——题 记

目 录

壹

风 雨 年 代 读 书 成 长

..... 1

贰

许 身 中 华 壮 我 国 威

..... 17

叁

同 窗 友 情 胜 似 兄 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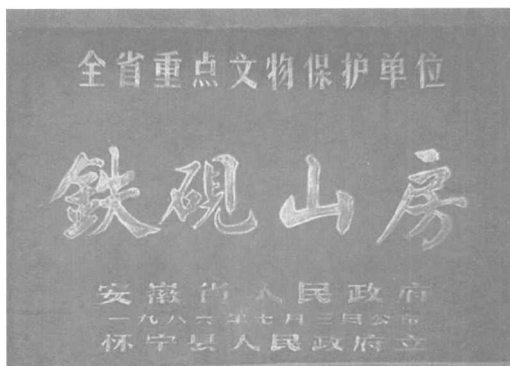
..... 59

壹

风 雨 年 代

读 书 成 长

铁砚山房，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这个蝉噪林静、鸟鸣山幽的南方村庄里，二百多年前建有邓石如的宅第。这位被推崇为清代篆刻、书法第一的大家，自号完白山人；又因友人赠其四方铁砚，遂以此为自己的书斋名，这所大院从此便叫做铁砚山房。

1924年6月25日，邓石如的六世孙邓稼先便诞生在这座铁砚山房里。经过百年的风风雨雨，故居早已凋蔽。断墙残瓦，破败不堪。1986年7月3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和怀宁县人民政府将铁砚山房作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整了院墙屋瓦和几间平房，又在大门外种了两



安徽省怀宁县城外白麟坂的铁砚山房，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诞生于此。

棵翠绿的松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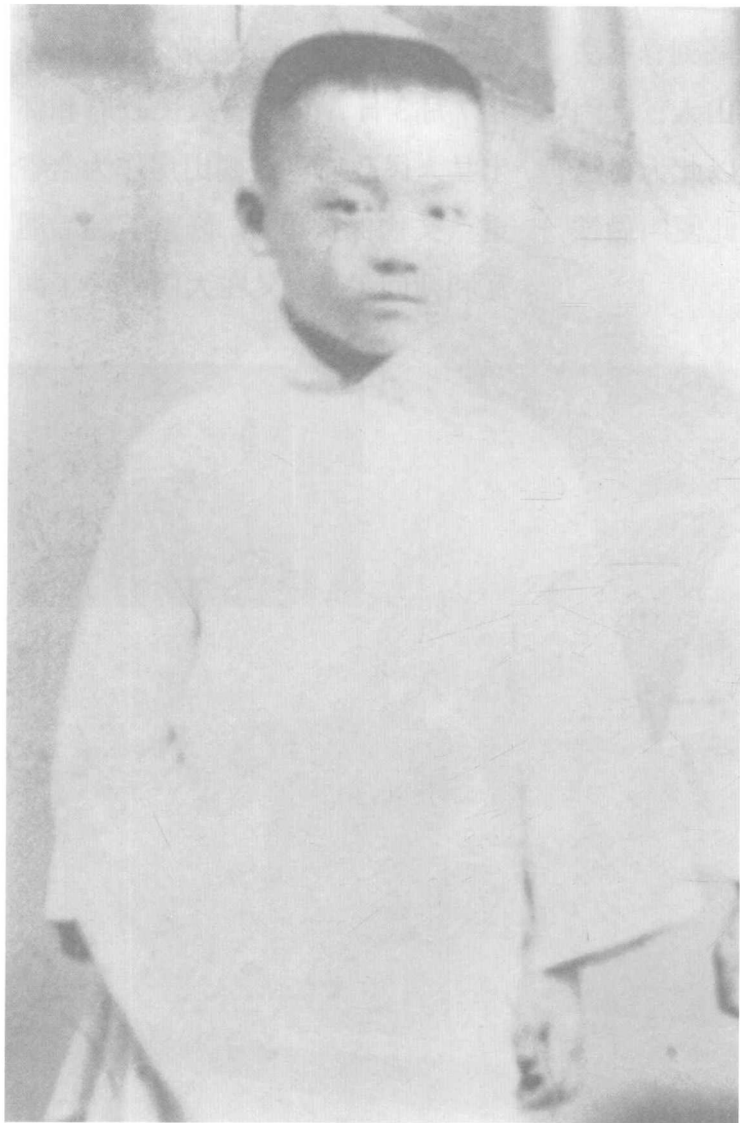
邓稼先5岁开始上小学，在离家很近的北平西城武定侯胡同小学读一年级。课余，父亲邓以蛰教授又命他去陆老先生的家馆中借读，又特请王老先生教小孩子们读《左传》、《论语》、《诗经》和《尔雅》等。邓稼先常常在父亲书房里，站在比他高得多的大铁火炉跟前背诵《左

传》、《论语》等古书。一次，父亲的挚友张奚若教授来访，正碰上稼先穿着一件齐地长袍站在那里背书。张先生觉得奇怪，便顺口问道：“叔存兄，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让孩子背这些东西？”张先生是学政治的，思想能紧跟历史进步的潮流，遇事必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态度。这时已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

了，所以他见到这位受过欧美文化熏陶的好友居然让孩子背诵《诗经》、《尔雅》，就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作为艺术家的邓以蛰教授却有他自己的眼光。他带着相当浓重的安徽口音笑着说：“嗨，我不过是要让小孩子们知道一下我们中国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这有好处。”

邓以蛰教授，生于1892年。在他浓厚的中国儒家学者气质中透着一些西洋风度。他小时

邓稼先5岁开始上小学时。





邓以蛰（父）（1892—1973年）和王淑澍（母）（1894—1964年），1959年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候受过其父邓艺孙先生的严格家教。邓艺孙先生在民国元年曾任过安徽教育司长，与苏曼殊等名士是性情投合的好友，在安徽学界也曾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少年时代，邓以蛰在老家苦读诗文，工画山水。1907年他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及

早稻田中学，以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从大学到研究院共学习5年。邓以蛰先生从美国归来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学贯中西的父亲不仅要邓稼先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同时也要他读外国的文学名著。在上小学时，

邓稼先就读了莫泊桑、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家写的小说。即便如此还嫌不足，又让他跟从王老先生学习国文。父亲对邓稼先的英文学习要求也很严格，亲自当启蒙老师，指点正确的学习方法，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邓以蛰教授对待孩子们的学习要求严格，却并不用孔孟伦常的严规厉矩来束缚孩子们的心性。他在国外给夫人的信中曾经写道：“我们是小孩子的亲爱的父母，并不是他们的阎王。”这自是与老先生受西方文化影响有极大的关系。他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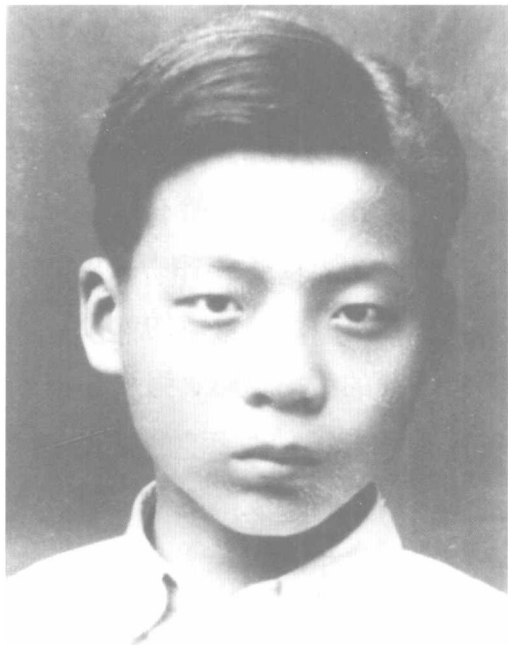
外国文化中汲取了精华，用于家教。邓夫人王淑蠲女士的性情温顺善良，一天到晚总是为孩子们操心，她脑子里原来就没有要对孩子们严加管束的想法。父母从两种不同的观念出发，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1934年摄于北平，姐弟四人合影。右起：邓稼先（10岁）、邓懋先（4岁）、邓茂先（18岁）、邓仲先（20岁）。



家里几个性格不同的孩子就像一棵棵未经修剪的松柏自由自在地长大而形态各异。

玩耍可以表现出一个人性格中容易被别人忽略的方面，在这里有时能清楚地看出一个人的才能。邓稼先小时候放风筝、抖空竹，在同学中技高一筹。一般的空竹不过瘾了，就找带把的茶壶盖、茶碗盖来玩。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都难不倒他。他还非常喜欢弹玻璃球。弹球要算好角度，指法要熟巧。爱弹玻璃球的孩子，也都爱积攒玻璃球。要是得到一两个嵌着五颜六色心柱的弹球，那真是心爱至极。在读书之余的空暇时间，他依然是随心所欲。有时候别的东西玩腻了，他就喜欢用双手吊在门框上，身子来回摆动，享受打秋千所特有的乐趣。他能够由慢到快，再由快到慢地悠出一种节奏来，有时甚至靠着双腿凭空蹬踹和腹肌的收缩来实现变奏。若在悠摆中见到有熟识的人来，他总要边打秋千边报来客的姓名。一次恰巧就遇上了也在北京大学工作的许德珩教授和夫人劳君展来访。许夫人对这个活泼的孩子印象非常深刻，而她自然不会知道这个顽童日后竟是她成大事事业的女婿。



邓稼先在北平读初中时
(约1936—1937年)。

邓稼先四年级改读四存小学到毕业。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到初二又转到崇德中学。崇德是所教会学校，注重英文。邓稼先的英文童年时就得益于父亲的教导，入了崇德之后可以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于比他高两班的同学杨振宁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帮助，邓稼先对理科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数学。中学时代的邓稼先依然喜欢玩耍，但已经不是一个顽童。对下棋、弹球之类的娱乐性活动的迷狂，很快就让位于对新知识的渴求。兴趣转移的如此迅速，不过是玩耍中就存有的那种喜好钻研的个性，在新

知识海洋面前的展开罢了。他开始读鲁迅的书，读更多的外国小说。

就在邓稼先的人生观刚刚萌芽，对人生和社会开始有自己的认识的时候，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了。日寇的入侵打乱了他平静的读书生活，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刺伤了他少年纯洁的心灵。一个人年轻时所受的强烈刺激，总是会留下终生难以除去的烙印。这以后，读书之外，他开始和一些同学聚会，谈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1937年以后日军统治下的北平，中国百姓受尽了屈辱。日本军部规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要鞠躬行礼。如果这样做，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就被一扫而光了吗？血气方刚的邓稼先，对此怒火满腔。他宁肯绕道走很多冤枉路，也不去干这种事情。他有人格，而人的尊严绝不能让别人任意玷污。从此以后，年轻的邓稼先在两条道路上迅跑，一方面仇恨日寇，热爱中华，关心社会；另一方面认真读书，刻苦用功。他由一个不懂事的顽童变成了一个有抱负的青年。

邓稼先高中一年级就已经能看外文小说，尽管还有些吃力，但他

非常高兴。他读的书籍越多，思想就越活跃，常常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他和一群思想激进的同学一起聚会，议论天下大事，相互影响，彼此激励，他们的思想越发成熟。对于他们，环境窒息所带来的苦闷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邓以蛰教授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为孩子有这样的思想和骨气而感到欣慰，但也有一种担心。母亲虽然谈不上有多大学问，可是心也很灵巧。见到邓稼先和一些同学来来去去聚会，她凭直感就觉着会出什么事似的，整天心里嘀嘀咕咕的。她信佛，在烧香的时候，不免暗中祈祷，盼着家里平安无事。

可是，父母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那时候，日军每占领我国一个城市，总要逼着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庆祝他们的胜利。这是最激怒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我们的城市沦陷了，还要我们去庆祝，这犹如我们挨了打，还要我们去向打人的人道谢一样。对此，人们敢怒不敢言，而民族仇恨总是因此与日俱增。有一次又开这样的会，在会后，邓稼先胸中的一腔仇恨怒火般升腾，他三把两把就把手里的纸旗扯碎，还不解气，他又把撕碎的旗子扔在地

上狠狠地踩了一脚。当狗腿子发现有人扔小旗子时，学生们已一哄而散，坏蛋没能看清谁扔的。这时邓稼先已重新回到志成中学念高三，因为崇德在他念完高中二年级时停办了。

但最终还是有人向志成中学校长报告了这件事。校长敷衍道：“我们学校的学生决不会干这样的事。”就这样把事情搪塞过去了。校长是邓教授的朋友，后来他知道是邓稼先干的，便来到了北沟沿邓宅。校长说：“邓先生，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别人密报的，这样下去怕是太危险了，想个办法赶快让他走吧！”

形势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家里只好让大姐邓仲先带着稼先到大后方昆明去，那里有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合成的大学和许多老朋友。从北京到昆明，千里迢迢，而且还要绕道异国他乡，父母当然是十分犹豫的。但是这时候邓仲先已经大学毕业，人又很能干，加上有另外两位教授的太太和孩子同行，事情才就这样决定了。

行期到了，这难熬的时刻，一家6个人，心里各是各的滋味。晚饭很丰盛，但谁都吃不下。父母亲对

姐弟二人有许多叮嘱，其中有一句话邓稼先一直记得牢牢的。当时，父亲坐在一把老式木椅子上，以从未有过的目光看着稼先，似乎心里有什么特别的事，一时说不出来。邓稼先经不住这种情感的撞击，他缓缓地把目光移到了墙上挂的《完白山人放鹤图》上。邓以蜚先生终于开口了，语调很平和、坚决。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父亲是凭着个人的生活经验，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意愿。他也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但这几句普通的话，是和邓稼先心中的潜在意识相合拍的，所以，他一下子就印在脑子里了。

妈妈和大姐、三姐在屋里哭泣，令人心碎的哭泣声一阵阵传了过来。邓稼先和小弟站在院子门口，他在最使人动感情的时候反而很冷静。他深沉地对弟弟说：“毛弟，现在我只有仇恨，没有眼泪。”这是一位16岁的少年在出走前留给弟弟的话。它充满了对民族压迫的反抗之情，掷地有声。年轻的邓稼先已经被环境逼得早熟，成为一名爱国主义者，而这将作为一条主线决定他一生的道路。

在1940年的春末夏初，他们姐弟乘船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不久，又乘船南行经香港到越南海防。当时香港是英国管辖下的殖民城市。这里有很多新奇的东西是邓稼先从来没有见过的。两层高的公共汽车像楼房一样，到站稍停，让乘客迅速上下。一天傍晚，大姐带他到码头上闲逛，遇到一些劳工在吃饭。这是一些衣衫褴褛的背米劳工，他们每天都扛着很大的麻包，上上下下地背米，而他们自己只能用碎米煮饭，也没有什么菜吃。稼先伏在一排栏杆上，痴痴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他呆了很久很久，他在想，为什么洋轮上的人那么富有，而这些苦力却如此穷困。

他们的船在香港靠码头卸货4天之后，又向南开到了越南海防，这里是法国的殖民地。海防街道两旁的商店有很宽的廊子，这是上层楼房延伸出来形成的，多雨的南国为了顾客的方便大都这样做。海防街面上虽有很多商店，但橱窗里和货架上商品很少。海防过境处的检查站口，立着耀武扬威的法国警察。过境时，法警随便拿走客人的财物，越南人备受欺压。前边一位老年妇女的一只暖水壶被扣下了。

老人穿着破旧的湘云纱上衣，灰色的裤子，身边带了一个小女孩，脸上显现说不出的委屈。她用越南话连比画带说，似乎是在求情。警察横眉瞪眼，一手将她推搡过去，不予理睬。这种细节，很快地触发了邓稼先的联想：北平、香港、海防这些被别人强占了的地方，怎么到处是些蛮横不讲理的事呢？

经过海防，再到河内；经过通往老街的那条路，再进入中国国境，终于到了昆明，这时已是1940年盛夏。昆明有很多好中学。但临离开北平时父亲说：“去了要上九中，老四管得严。”老四就是邓稼先的四叔邓季宣，法国留学生，当时在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任校长。大姐遵照父命，到昆明后不久，就把邓稼先送到四川江津。他插班入高三，于1941年7月在国立九中高中毕业。

中学毕业后，邓稼先到重庆去考大学。一天，他走在临江的山路上，正遇到日军飞机轰炸。他眼见一颗颗炸弹落到对岸的屋群里，房屋塌作一堆，大火升腾，浓烟滚滚。头顶上呼啸而过的敌机，像是一头头发疯的野兽。地面上没有任何还击或抵抗，任其肆虐。而他和路人

都面对大江，将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贴靠山石，等待着眼前这场惨祸结束。忽然，一颗炸弹在离他们很近的江面炸开。如果再偏过来一点，他们就都完了。他终于明白，大后方竟是这样的不安全，一个弱国是没有平安日子可言的。

1941年秋，邓稼先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号是A479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简陋，分散在昆明市的好几个地方。但它是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3所大学在1937年南迁后合并办起来的一所学校，名教授云集，是当时的最高学府。

联大物理系的师资力量很强，有叶企荪、吴有训、赵忠尧、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等许多知名学者。除了众多的名师指点之外，邓稼先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的大姐夫、知名教授郑华炽当时正好也在联大物理系执教，并于1944年初接任物理系主任。邓稼先有了这样一位教授的经常指导，从中获益良多。此外，在崇德中学时的好友杨振宁也就读于联大物理系，比邓稼先高三级，在学习上经常帮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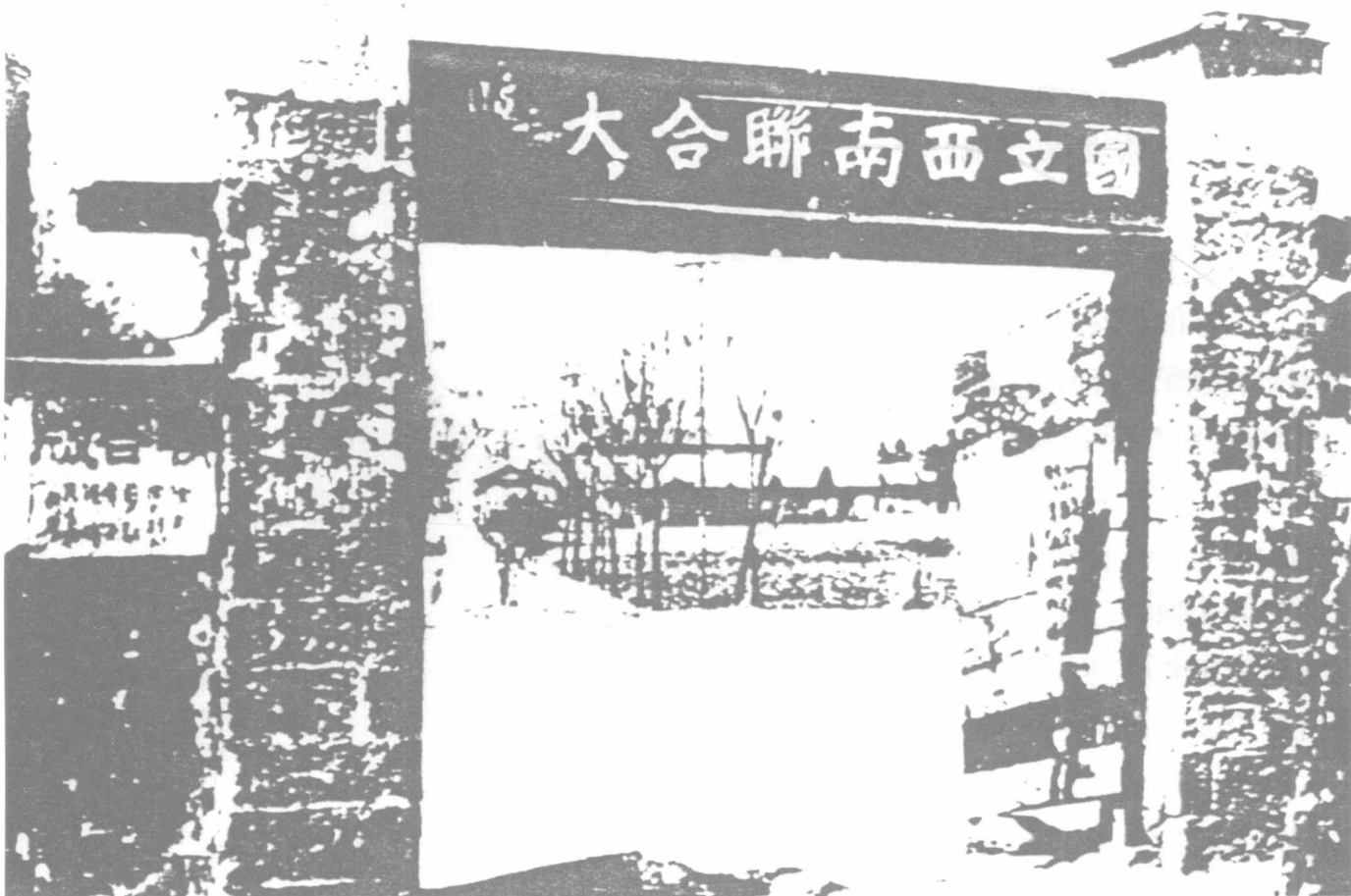
联大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就连阿拉伯数字的斜度多少都



1941年，摄于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邓稼先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年17岁。

有要求，那真是一丝不苟。名师严教使这所学府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联大校歌歌词中有“绝微移栽桢干质”（意思是说在边塞城市培育栋梁之材）以及“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句，可说是十分中肯的。

如果说当时教授们的生活十分清贫的话，学生的生活简直就是穷苦不堪了。土墙茅草顶的学生宿舍跟临时工棚没有什么区别。房间很大，又透风又进雨，每一大间屋子住40个人。这种环境对于静心读书的莘莘学子来说实在像是一个意志的烤炉。学生一律睡双层木板床，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云南省昆明市（1938—
1945年）。

两床之间有一个长条桌，桌子下面有一块板子可以放东西。同学们都很穷，就这样一点简陋的用具也将就着把东西放下了。有些特别穷的学生到12月还只穿着一条单裤。好在昆明不冷，一条裤子也能混得过去。偶尔下雪，他们使用被子裹着腿坐在床上看书。宿舍里只有油灯，教室和图书馆才有电灯。夏天，屋内热气腾腾，他们穿着背心和短裤，把脚蜷缩到床底下，脚背挨着从潮湿的泥土地里长出来的小草，就这样专心地做功课。

学生们开始时还可以吃饱，后来物价猛烈上涨，民不聊生，学生的吃食也紧张起来了。食堂平价米里的砂子很多，同学们有时从饭碗里挑出大点的砂子，互相打着玩。盛饭时第一碗只盛半碗，赶忙吃完再去盛第二满碗，这样才能吃饱。若第一碗盛满了，去盛第二碗时，就没有饭了。学校做饭的地方是一排平房，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学生们就在图书馆旁边的两个大棚子里吃饭。如果刮起风来，砂子饭上又浇上一层“胡椒面”，